

西汉西北地区长城地带探究

——以西汉政府控制区为例

黄永美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随着汉匈战争的胜利,西汉政府在长城内建设边郡,并完善长城防御系统。在长城外,先置校尉,再建城防御,紧跟着屯田保障,故而长城地带初见规模。在长城防御保障下,西汉政府通过徙民实边、允许戍卒家属居边、发配刑徒、安置属国等方法充实长城地带。内地而来的农耕者为长城地带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在西汉政府鼓励下,长城地带畜牧业也得以发展。这些都为长城地带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为长城防御提供了支持;更稳定了西汉王朝边郡局势,宣扬了西汉国威;为丝绸之路贸易提供了保障,为长城内外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环境。

关键词:西汉;西汉长城;长城地带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3-0012-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302

苏秉琦先生最早提出“长城地带”这一概念,并对长城地带作了比较明确完整的区域划分,即从东向西主要包括以昭盟为中心的辽东地区、河套地区、以陇东为中心的甘青宁地区三个部分^{[1]12,[2]15}。20世纪90年代初,李凤山先生又从民族角度提出了“长城带”概念,并指出:“作为长城民族融合的纽带,应是以这条长城为中,南北各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东西数千公里的广阔地带,它的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天国界线以内的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以及吉林、青海、新疆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另外,居住在今天国界线以外的某些民族的先民,也参与了特定时期的长城带的民族融合。”^{[3]44}而且“长城民族融合纽带的民族融合从新石器时代就存在”^{[4]55}。由此可见,苏秉琦、李凤山先生提出的长城地带,指在长城修筑之前、长城所在地理范畴内的农牧交错带,即此概念是将长城作为地理坐标意义而言的。

笔者所说长城地带是以长城作为历史存在而言,重在考察长城作用,即长城修筑后对长城内外宜耕宜农地区的影响,亦如张子宇所言:“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在本文中的区域范围是以明长城本体为主线,包括沿线的山险、河湖、烽燧、壕堑、驿传、堡垒等自然及人工附属设施在内的军事防御体系所在地段,亦包括周边的军屯、商屯和交通干线用地等一切服务于长城军事防御功能的相关地区,并且结合历史及当今自然人文在长城地带的交错分布特征相应地进行扩展,而扩展的根本依据就是‘农牧交错带’的概念——即在长城本体周边,凡是历史上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进行战争或经济文化交流的所经地带,便应纳入长城地带的范畴。”^{[5]108}

收稿日期:2019-11-08

作者简介:黄永美(1983—),女,历史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长城研究”(17FZS025),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秦汉时期的国家构建、民族认同与社会整合研究”(17ZDA180)。

故本文所言的长城地带是指西汉时期,在长城修筑后,在墙体、天田、堑壕、虎落、关城、水门、烽燧、坞、障城、山险、水险等整个长城防御体系影响下,南北、东西各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的农牧交错地带——即在长城防御体系周边。由此可见西汉西北地区长城地带既包含长城内西汉政府控制下的边郡、属国,也包括长城外西汉政府控制下的屯田区,还包括匈奴、羌、西域等控制下的宜耕宜农地区。本文主要以西汉政府控制区为例进行探讨。前人已有诸多关于河西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移民、郡县设置等方面^{[6][7][8][9][10][11]}。然既有研究对这一切开展的前提即长城军事保障的关注度不够,故本文重点探讨西汉时期在长城防御系统完善下长城地带的发展。

一、西汉西北地区长城的完善和初见规模的长城地带

西汉初对长城防御多为修缮而少修建,如高祖二年,“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缮治河上塞”^{[12] 369}。西汉长城防御大规模修建是在汉武帝时期。其时出击匈奴取胜,于是在西北地区修建防御工事,如元朔二年,“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12] 2906},“太初三年,汉使光禄徐自为筑城障列亭至卢朐,韩说、卫伉屯其旁,使路博德筑居延泽上”^{[12] 2916}。汉武帝之后的诸帝统治时期对长城防御也多修缮少修建。

关于汉武帝时期的长城修建,有学者认为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规模的修筑长城,大体分四次。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故目前对河西长城的修筑过程有四段论和五段论之分^{[13] 44}。当然不否认军事进攻取得胜利即要采取保卫胜利果实的措施,但是一边进行对匈奴的战争,一边进行长城修筑,恐怕不太现实,如史载元朔二年(前127)出击匈奴后,“其明年,匈奴入杀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门千余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汉数千人”^{[12] 2924},因为战争正在进行,一方面互有进退,一方面恐难集中人力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修筑。

西汉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在长城地带设郡、置田的记录。在设郡置田的同时,对其保护防御当随之而行。如《史记·匈奴列传》载:“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12] 2906}《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朔二年(前127),“使建筑朔方城”^{[12] 2923},又有“以将军筑朔方”^{[12] 2943}。《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也载元朔三年(前126),“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12] 2950},明确筑朔方城之时便有朔方之郡的建设,长城建设也随之配套。

西汉长城地带建设是一个漫长持续的过程。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张掖、酒泉,修筑东起令居西至酒泉的防御工程^{[11] 105-108[14][15]}。元封元年(前110)至元封三年(前108),“酒泉列亭鄣至玉门”^{[16] 2695}。元封四年(前107)和元封五年(前106),置敦煌郡,开始设防于令居西至盐泽地区,筑酒泉塞^{[17] 21[18] 17}。《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也载:“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16] 2694}太初三年(前102),“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16] 3873}。太初三年(前102),在居延泽、休屠泽筑塞设防。天汉初于敦煌以西建烽燧线^{[17] 21[18] 17}。昭帝元凤六年(前75),“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16] 232}。宣帝神爵三年(前59),置西域都护护北道,治乌垒城,楼兰至渠犂的烽燧亭障建成^{[16] 3874}。目前关于河西四郡的修筑年代,因居延汉简的研究又有新进展^[19]。然本文并非为论证其准确时间,主要为说明随着边郡建设汉长城也在不断完善,二者相辅相成。而且随着长城防御的完善,防御戍卒和设备也得以完善,如《史记·平准书》载:“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贍之。”^{[12] 1439}

在长城外,西汉政府也有建设。其采取的是先置校尉,再建城防御,紧跟着进行屯田保障的发展模式。《汉书·西域传》载:“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16] 3911-3912}此外,桑弘羊与丞相御史曾向武帝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犂皆故国……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

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臣谨遣征事臣昌分部行边,严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选士马,谨斥候,蓄茭草。”^{[16] 3912}桑弘羊建议中明确提出在长城外建设的模式,将置校尉、建烽燧、屯田三者紧密相连,相互依存。

综上,无论是在长城内施行边郡建设与长城相辅相成的模式,还是在长城外采取先置校尉、再建城防御、紧跟着屯田的模式,长城防御系统的完善都是不可忽视的。随着长城防御系统的完善,有效的军事防御为边郡和长城外屯田的建设提供了保障,长城防御体系内外得到开垦,于是长城地带初见规模。而且在汉长城完善后,长城内外政局缓和,西汉政府更有机会进一步着手充实和发展长城地带。

二、西汉西北地区长城地带的充实和发展

西汉长城防御系统的完善为长城地带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更为长城地带的发展提供了军事保障。《史记·平准书》载元鼎五年(前112)武帝巡视时发现,“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12] 1438}无“亭徼”则“诛”太守,可见汉武帝对长城防御的重视。伴随着长城戍卒的充实以及西汉“徙民实边”政策的实施,长城地带得以充实。同时,长城内外屯田发展也为长城地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1. 西汉西北地区长城地带的充实

西汉文帝统治时期,晁错曾谏言徙民实边,“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16] 2287}。到汉武帝时期,徙民实边规模更大。《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时两次徙民实边,一是“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12] 1425};一是“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2] 1439}。《史记·匈奴列传》载:“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12] 2909}《汉书·武帝纪》载元鼎六年(前111):“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16] 189}《汉书·西域传》也载:“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16] 3873}

汉武帝之后的诸帝仍徙民实边。《汉书·西域传》载宣帝神爵三年(前59),“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鞬,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16] 3874}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东海郡吏员考绩簿》中有“平曲丞胡毋[钦]七月七日送徙民敦煌”^{[20] 29}的记录。学者研究“徙”应为“徙”,因其后接“民”字,在汉代文献中“徙民”是习惯用法,且敦煌又是西汉徙民之所,又《考绩簿》成于汉成帝永始四年(前13),由此可见成帝时也曾徙民敦煌^{[6] 25}。

西汉政府除了直接徙民实边外,还允许长城防御戍卒的家属居边。如《汉书·西域传》载:“良等随入,遂杀校尉刀护及子男四人、诸昆弟子男,独遗妇女小儿。”^{[16] 3926}可见戍己校尉带领家族前往。居延汉简229.39简“家属三月食”^{[21] 63}、231.25简“制虏隧卒张放妻大女自予年廿三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未使男野年二用谷一石六斗六升大”^{[21] 68}、254.11简“俱起隧卒丁仁母大女存年六十七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弟大女惠文年十八用穀二石一斗六升大弟使女肩年十三用穀一石六斗六升大凡用穀六石”^{[21] 123}等,均表明家属随戍卒居边情况。而且无论是吏还是一般戍卒,都可以带家属,因为“两汉政府为充实边塞人口、稳定军心,还鼓励吏卒携带家属在边塞常居,这在汉简中有所反映,而且军中准许带家属的人员可以是吏,也可以是一般戍卒”^{[9] 63}。为此,还有专门的家属署名籍,如185.13简“卒家属在署名籍”^{[22] 213}、276.4A简“寿二年十一月卒家属廩名籍”^{[21] 199}。

除徙民实边外,还徙罪犯。《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五年(前118),“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16] 179}。《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载汉武帝时戾太子事败,“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16] 2882}。《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载宣帝时丞相杨敞之子杨恽犯罪,“妻子徙酒泉

郡”^{[16] 2898}。《汉书·翟方进传》载汉成帝时,“商素憎陈汤,白其罪过,下有司案验,遂免汤,徙敦煌”^{[16] 3418}。《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汉哀帝时,“贺良等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16] 3193-3194}。同时,还将战俘或内附部族安置在边郡,如《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载:“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16] 2483}

另外,居延汉简中 168. 12 简有“[倍]迫秋月有徙民事未阕”^{[22]168}、188. 19 简有“月有徙民事”^{[22]219}等内容,虽不明确日期,但仍能看到西汉政府徙民的事实。总之,自汉武帝始,西汉政府一方面大规模修建长城,一方面或徙民实边,或安置俘虏,或安置内属部族充实长城地带,且这些举措一直延续到西汉末。

2. 西汉西北地区长城地带的发展

有学者统计武帝时期先后向西北徙民总数约 160 多万^{[8]13},其中“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16] 2700},伴随戍卒而来的还有大量家属。这些长城地带的充实者中有些本就为屯田而来,如居延汉简的田卒记录,11. 2 简“田卒淮阳新平盛昌里上造柳道年廿三”、11. 18 简“田卒大河郡东平陆北利里公士张福年”、19. 40 简“田卒淮阳郡长平业阳里公士儿尊年廿七”、19. 41 简“田卒淮阳郡长平南固里相□□十二月己巳出”、37. 38 简“东郡田卒清零星里大夫聂德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等^{[23]39,40,67,121}。这些充实者不仅为长城地带农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还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汉简中有见田卒名籍,简(14)-(19)均出土于居延大湾,说明大湾是重要的屯田区。田卒多来自淮阳郡、大河郡、济阴郡、昌邑国等农业经济发达的关东各郡国”^{[9]59}。

西汉政府给予徙民而来的农耕者大力支持,如“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12] 1439};还提供犁牛等借贷业务。在赵过改进犁耕技术后,西汉政府将这一技术推广至长城地带,“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16] 1139}。西汉昭帝时期,还曾减缓振贷业务。《汉书·昭帝纪》载元凤三年(前 78),昭帝下诏:“乃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应劭注曰:“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后丞相御史复间有所请。今勅自上所赐与勿收责,丞相所请乃令其顾税耳。”^{[16] 29}这些无形中都促进了长城地带农业的发展。

长城地带本是宜耕宜牧区,“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16] 1645}。所以西汉政府在长城地带发展农业的同时,也鼓励发展畜牧业,《史记·平准书》载武帝巡视新秦中时,“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12] 1438}。同时用借贷方式帮助当地百姓发展畜牧业。此外,充实者中亦有大量原本是生活在该地区的游牧者,如安置的属国和战争所俘获的人多为游牧者,这对长城地带畜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三、西汉西北地区长城地带发展的影响

在西汉政府政策扶植下,长城地带得以充实和发展。富足的经济基础为百姓安居乐业提供了可能,也为长城地带的政局稳定提供了基础,更为边疆防御和长城内外的交流提供了保障和基础。

1. 长城地带的发展对长城地带的影响

西汉西北地区长城地带的发展推动了整个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首先是劳动力得到了充实,农业得到发展。史载其时屯田规模,“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12] 2911}。居延汉简中有余粟记载。在敦煌也有此类记录,说明边塞防御系统从当地农民手中购粮的做法在西北边塞广泛存在,且不限于某一地区。这也说明当地农民粮食生产富足,不仅可以自用,还有剩余出卖^{[24]65}。

其次,在农业产量富足、畜牧业发展基础上,长城地带工商业也得以发展,“农业经济的开发带动和

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工商经济的发展”^{[25]85}。由此百姓生活富足,边郡政局稳定。居延汉简 212.7B 简有“官民颇知律令文”^[21]内容,更有“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为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余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16]卷28下《地理志》下,1645}的记载。

随着西北地区长城地带防御工事的构筑,西北地区道路建设也得到改善。“在构筑长城边防工事的同时,秦汉政府相当重视西北新经济区的建设,西北长城道路成为西北新经济区的主要动脉。从西北长城防区汉墓出土车辆规模及汉墓壁画中关于运输活动的画面可以知道,当地经济的繁荣是以交通的发展为条件的,而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交通的发展。”^{[26]16,17}

2. 长城地带的发展对西汉王朝的影响

对整个西汉帝国而言,长城地带的发展,不仅保护和开发利用了新获得的疆域,还缓解了西汉帝国内部存在的贫民、流民压力。“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12]1425}“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之。”^{[16]2197}

《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出击匈奴时曾调用“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12]3176}。汉简中也有“橐佗持食以救吏士命以一郡力足以澹养数十人(一二四)”^{[27]225}的记录。由此可见早期汉匈之战时,需要从内地运输粮食到战场,不仅数量大,消耗亦大。“又据汉简所记,一个戍卒一年的口粮为21石,若从内地运输,需人一、车一、牛一。”^{[28]72}长城地带农业的发展,不仅减轻了政府从内地长途运输的消耗,“甚至还可以调拨以救内地之灾,居延汉简有‘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臣调,昧死言武□以东至河西十一郡十一农都尉官调物钱谷漕转糴为民困乏启调有余给’内容,简中的大司农名调,缺字疑为武威的威字,上书皇帝请求调河西的谷物钱粮救济内地因乏饥谨的农民。可见,居延屯田对当时的国家财政有很大帮助。”^{[7]358-359}从该层面上看,长城地带的发展无疑是增进了西汉王朝整体经济的发展。

长城地带的经济发展为长城防御提供了物质保障,“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16]2286}。长城地带乃至边郡的安居乐业更有利于长城戍卒的就近选择,减少了从内地增调戍卒的不便,增强了长城防御力度,也有利于完善长城防御工事。长城地带的稳定、边郡的建设无形中增强了西汉帝国的向心力,有利于西汉帝国政局的稳定。

随着长城地带的发展,中西方贸易也随之而兴。《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仓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12]3179}《汉书·西域传》也载:“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16]3873}即便在两汉动乱之际,贸易仍在继续,“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29]1098}居延汉简中有“贾人”“贾车”记录,“说明专营贸易的商人在河西地区的活动”^{[30]27}。

因长城地带与西域地区的地缘之利,所以长城地带的发展对西域而言,不仅仅是发挥“农耕社会样板”的效用,更是影响了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无形中提升了西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和威望。《梁书·康绚传》载康绚“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31]290}。这说明当时西域各国侍子要在河西待诏,被允许才可以进入京城,而且是分批进入。使臣、商旅恐怕亦是如此,“当时从西域各国来的使臣、商旅,不能直至京城,需要在河西待诏,等汉朝诏令下达后,一批一批放行,则河西经常住有一批西域人留居……允许进京有人数限制,不少随行人员只能停留在河西,其中无力返回或其他原因不能返回本国的,人数也不会太少。这些人住在河西,有的参与汉朝军政,有的自谋生计。”^{[10]73}面对来往的侍子、随从、使者、商人,河西地区、长城地带不仅是西汉王朝边境前沿,更是展示大汉实力的“样板”,长城地带的稳定和发展也是西汉王朝在西域影响力度的“反应器”,是显示西汉王朝国威和防御力度的重要阵地。

3. 长城地带的发展对西域的影响

西域地区本已有农业发展,史载西域“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16]3872}。其中且末种五谷,“且末以往皆种五谷”^{[16]3879};难兜国“种五谷、蒲陶诸果”^{[16]3884};罽宾国“种五谷、蒲陶诸果,粪治园田。地下湿,生稻,冬食生菜”^{[16]3885};乌弋山离国“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16]3889}。有的农业种植面积还有一定规模,如渠犂“故轮台(以)东捷枝、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16]3912}。长城地带农业发展的“样板效果”必然对西域地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长城地带的发展对西域政治也产生了影响。如鄯善国,“王自请天子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一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16]3878}长城地带的发展还宣扬了西汉王朝国威,《汉书·西域传》载:“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唯其小邑鄯善、车师,界迫匈奴,尚为所拘。而其大国莎车、于阗之属,数遣使置质于汉,愿请属都护。”^{[16]3930}又载:“自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16]3874}

长城地带的发展还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西域地区有的因所处要道之地,商业发达,如疏勒国“有市列,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16]3898}。长城地带的发展为其与西域之间贸易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安全的市场和畅通的道路,“由于西北长城防区经济的进步和塞外游牧族贸易的发展,当地商业繁盛一时,西北长城道路又成为全国交通网中繁忙的商路”^{[26]17,18}。此外,长城地带的发展还为其与西域之间的贸易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货源。其时贸易除了官方贸易、关市外,还有大量的私市、民间贸易存在,“走私行为,在当时贸易总额中也许占有相当大的比重”^{[30]43},“市庸平贾的形成,可以说明当地民间贸易活动的活跃,已经使得经济生活相对成熟,以致自然规范了大略的定规”^{[30]31}。而私市和民间贸易的货源往往是以就近选择为主,所交易的即长城地带的货物,因为从内地运输费用昂贵。

要之,西汉时期,特别是在汉匈战争之后,汉政府通过屯田、建设边郡、加强长城防御等多种方式不断充实和发展长城内外宜耕宜农地区,从而形成长城地带的发展。在长城地带的稳定和发展影响下,长城内外的西汉王朝和西域地区之间通过互派使节和侍子、联姻、丝路贸易、混居等方式加强了联系,交流内容也逐渐增多,贸易规模有所扩大,长城内外的文化也随着交流方式的增多而得以交流^{[32]138-139}。这不仅稳定了汉王朝边疆,宣扬了大汉国威,还影响了西域的政治经济,互相得以促进。

[参 考 文 献]

- [1] 夏明亮,童雪莲.“长城地带”考古学术语属性探讨[J].东北史地,2012(5).
- [2]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文物,1981(5).
- [3] 李凤山.长城——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纽带[C]//政协秦皇岛市委员会,《长城学刊》编辑部. 山海关首届中国长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2.
- [4] 李凤山.长城带民族融合史略[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1).
- [5] 张子宇.历史地理学意义上的长城地带划分[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 [6] 刘磐修.汉代河西地区的开发[J].历史教学,2002(11).
- [7] 江海云.汉简中所见的河西开发及启示[J].敦煌辑刊,2007(4).
- [8] 沈飞德.西汉徙民实边与唐初羁縻政策辨析[J].历史教学问题,1990(5).
- [9] 杨芳.汉简所见河西边塞军屯人口来源考[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1).
- [10] 王宗维.汉代河西与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J].新疆社会科学,1985(3).
- [11] 张荣芳,王川.西汉长城的修缮及其意义[C]//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 [1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3] 黄永美,徐卫民. 汉长城研究综述[J].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5).
- [14] 陈梦家. 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M]//陈梦家. 汉简缀述.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5] 王昱,崔永红. 令居塞建立时间考辨[J]. 青海社会科学,1987(4).
- [16]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7] 吴初曩. 河西的汉代长城[J]. 文博,1991(1).
- [18] 吴初曩. 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 [19] 刘淑颖. 秦汉迁徙刑与迁徙地[D]. 武汉大学,2014.
- [20] 滕昭宗. 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文物,1996,(8).
- [21] 简牍整理小组. 居延汉简(叁)[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6.
- [22] 简牍整理小组. 居延汉简(贰)[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
- [23] 简牍整理小组. 居延汉简(壹)[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4.
- [24] 于振波. 简牍与秦汉社会[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 [25] 张南. 论西汉长城边区的经济开发[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9(3).
- [26] 王子今. 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2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敦煌汉简(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28] 赵俪生. 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
- [29]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0] 王子今. 秦汉边境与民族问题[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 [31] 姚思廉. 梁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3.
- [32] 黄永美. 西汉长城的修建对长城内外的影响探究[J]. 河北地质大学学报,2019(3).

Study on the Great Wall Zone in Northwest Regio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ake the Government-controlled area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s an Example

Huang Yongmei

(School of Historic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estern Han government winning the war, the Western Han government built the border of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Great Wall was fully equipped. Outside the Great Wall, first the lieutenant was set, then the defense was built, followed closely by the security of the camp, so the Great Wall area first saw the scal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Great Wall,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government enriched the Great Wall zone by means of migrating civilians to cultivate, allowing migrants of the garrisons' family to live, banishing criminals, and resettling the country. Among them, farmers from the inland provided labor force,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too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Great Wall Zone.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Western Han government, the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Great Wall Zone has also developed. All of thes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Great Wall area economy,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Great Wall defense and stabilized the situation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the county. Meanwhile, it also promoted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provided protection for the Silk Road trade and suitable environment for cultural exchang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Great Wall.

Keywords: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Great Wall in the Han Dynasty; the Great Wall zone

[责任编辑:刘力]